

18213

湖南大庸县志

第八卷

民族志

(恳求教正稿)

尚待审核
请勿引用

马龄编纂



大庸县志办公室编印

前 言

大庸县是湘西“老、少、穷”山区县之一。在远古时代，这里曾经是“荒僻”之地。殷周之世，本境是“荆蛮”的“南蛮”。秦汉之际，虽建为郡县，但尔后长期被统治者视为“蛮夷”地区；或是“羁縻”州县，或是“卫所”地区，各民族杂处，在重重苦难中煎熬了数千年。经过“改土归流”特别是经过近百年历次革命运动，逐渐实现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从而发展成通都大邑。近几年按照国家民委1982年关于恢复土家族成份的范围、原则和方法，开展民族识别与恢复工作以来，全县除其他少数民族以外，单算土家族人口，到1984年为止，已达到18万多人，占全县人口53%以上。

胡耀邦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各族的共同繁荣，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问题。”所以就一个县来说，为了加强县内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开展四化建设，尽快摆脱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贫困与落后状态，尽快使全县各族人民共同繁荣富裕起来，无论干部和群众都有必要充分、正确地了解我县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借鉴已往的经验教训，摸清各方面的底数，并提高自觉性和责任感，以便有的放矢，做出实效，预见，开拓未来。

鉴于全县居民除汉族以外，少数民族以土家族人口最多，所以

在篇幅和表述上有必要以土家族为主。同时由于土家族先民没有文字，不能不充分利用汉文纪录下来的文献资料。这样，就只能越过汉族文人的历史局限和民族偏见，去求得正面认识，去窥见土家族先民的历史本来面貌。其中涉及从前汉族与土家族先民之间的关系时，当严格尊重历史事实，力求实事求是，公正合理，言之有据。值得一提的还有历史文献记述民族间的矛盾和战争的较多，而记述和睦相处时期经济文化建设的较少。因此，我们除了努力弄清民族间战争排挤者的罪责以外，还将尽可能以“战争是经济、政治的集中表现”为观察焦点，涉及经济、政治状况。在某些问题上，还和与有关兄弟县，兄弟地区的情况加以比较，使某些现象的本质属性可能明晰一点。

这种研究刚刚开始，疏漏讹误之处必定不少，尚望关心并了解这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的同志多加指导，以便修改补充。

（注释）“老、少、贫”：老革命根据地，少数民族聚居区、穷困落后的简称。

大庸县志办：马 敏

1985年10月24日

《大庸县志·民族志》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民族源流和现状	1—20
第一节	传说时代的初民	1
第二节	土家族的源流	4
第三节	大庸土家族实体	8
第四节	大庸白族的源流	14
第五节	大庸少数民族的分布、人口	15
第二章	民族特点	21—34
第一节	地域、生活、语言	21
第二节	心理素质	24
第三节	信仰与禁忌	28
第四节	风俗习惯	31
第三章	政治、经济	35—51
第一节	明代以前的概况	35
第二节	明清时代《卫所》与土司的统治	37
第三节	民族的交往与融合	40
第四节	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	42

第五节	茅岗土司事略	44
第六节	改土归流前后	47
第四章	历代的反抗斗争	52—67
第一节	压迫反压迫的社会原因	52
第二节	封建时代的农民暴动	52
(一)	东汉和单程反“南征”	52
(二)	明初覃 反夺田反饥饿	57
第三节	辛亥革命前后	62
第四节	参加国内革命战争	63
第五章	民族区域自治	68—89
第一节	民族聚居区的民主改革	68
第二节	农业合作化	73
第三节	民族政策的宣传落实	75
第四节	各民族团结协作	79
第五节	各项事业的发展	81
结束语		90

第一章 民族的源流和现状

第一节 传说时代的初民

大庸上古时代的初民，象别的许多民族一样，也是先有人类的活动，然后有部落，民族的历史。

在文字记史之前，是古老的传说。

具有“活化石”价值的传说，大庸有关于“尧舜放欢兜于崇山。”这与西郊文物“古人堤”的文化遗存年代相近。据说：

“崇山（大庸所乡）顶上连五间李家村这一带地势雄壮，对面七星山七沟八岭朝向此处。这就是欢兜屋场。从前有个皇帝怕这里出反王，曾派官兵来把断“龙脉”；以后才没有出事……”

这个传说，在崇山各自然村妇孺皆知。清代几部《永定县志》还有关于欢兜墓的记载：崇山山上有巨坟，传即欢兜之墓。

这个传说，与西汉伟大历史家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有关记载不谋而合。据说，上古唐尧、虞舜交替时，有个叫欢兜的部落长不服，在江淮一带造反，舜战胜了欢兜及其他反对派，对欢兜部落采取“放逐”的办法：

“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①

这就告诉人们，在欢兜部落迁入本境时原来的土著先民叫“南蛮”。南蛮，原是很多部族的总称，据顾颉刚《中国历史地图集》

定在“濮人”区域之内。由于种类繁多，又叫“百濮”。^① 湖南博物馆何介物经过考古论证，则以为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楚国南部有楚、苗、濮、巴、庸、罗等民族，而以楚人巴人为最盛。

中原华夏人和欧夷部落以及南方诸“蛮”都是传说时代的不同部族，四千多年前的生产、生活状况怎么样？有哪些共同之点？

1980年6月湘西考古工作队在大庸西郊水井岩澧水北岸“古人堤”作了试掘，发现下层有：磨光石砧、打击石片割削器，并采集到泥质灰陶、印纹硬陶等，从而被认定上层为战国文化，下层为原始社会晚期文化遗物。^②

这些石器和陶器制作规范，与澧水下游安乡划城岗遗存，与湖北京山“屈家岭文化”^③相似。可见其间存在明显的渊源关系。其时代与中原尧舜时代相近。郭沫若《中国史稿》引用甲骨文《殷契粹编》中商代卜辞：

“高祖夔……”（nao 挠，^夔的古字）

郭说，“^夔，就是舜，是夷人的一个分支”。^④ 河南省登封县王城岗关于夏禹古城堡的发掘，都证明了关于^{尧舜}传说的真实性。因此，有关尧舜时代的生产生活的记载，可以推见本境古代先民的生活面貌：

“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舜耕历山，人皆让畔；渔雷泽，人皆让居；陶河滨，器皆不苦窳（yu 窳，坏也）一年而所居成聚……”^⑤

这就是当时的生活画面。那时中原与南越先后进入了农、渔、猎的结合；从深山转移到河滨，由石器到陶器……

崇山，澧水沿岸的传说与文物近是。

但是，历来对欢兜崇山有两种说法：唐代杜佑《通典》以为在澧阳，即本境；而孔颖达《十三经注疏》则以为在“交广之域”。

其所以产生这种分歧，关键在于汉唐学者具有不同的“国境观”。按理，在尧舜时代，中国就是“中原”，当今中国的国境观，到秦始皇统一时，才确立起来。现代历史地理大师顾颉刚先生说：

“中国一统之局，至秦始立。殷周之世，则大邦与小邦并峙，蛮夷与诸夏杂居。王畿止于千里（以河南开封，安阳为中心半径500华里）……至于春秋，交通始广，至于战国，国境始大。”⑥

根据顾先生研究，可以看出，欢兜崇山“交广说”滥觞于西汉贵族学者刘安的《淮南子》，刘安为了贬低被^{等到}刘邦^朝灭掉的秦始皇统一全国的历史功绩，在国境问题上就极力夸耀“五帝之德”，把中国的南北疆域扩大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⑦

由此可见，欢兜崇山在本境无疑。因而西汉诗人司马相如《大人赋》云，“余欲往乎南俟：历唐尧於崇山兮，经虞舜于九疑。”⑧“崇山”与“九疑”作宾词并列为尧舜南疆的荒服之地。唐代诗人王维《欢兜墓》诗云：

“蛮烟荒冢自千秋，

夜遯空余鸟雀愁。

周鼎不辞亡国恨，

却怜孤墓近欢儿。”⑤

（按：崇山在澧水南岸，赧王墓在澧水北岸。）

嗣后，在历史长河中，濮人、三苗，先后被楚、汉等民族融合
的也有，迁徙他处另有族称的也有，地方史志无法纂叙。

第二节 土家族的源流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记尧舜时代，长江、汉水以南
就有了“南蛮”的生存繁衍。既然如此，那么这个“南蛮”，除“
百濮”“百越”以外，今日湘鄂川黔接壤地带的土家族其源流怎样？

大庸境内的土家人民的根盘和实体又是什么样子，其基本特征
与其他兄弟地区有哪些共同之点？几千年来发展脉络和重大事件如
何等等都值得逐步加以深究。

这里，着重看看土家族的源流。

土家族作为“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是建国以后，
1956年根据湘鄂川黔土家群众的要求，经过专家的调查研究才
被国务院认定的。原因就是从前汉族史学^家对她的历史记载常常陷于
错杂、混淆、变易之中。经过民族史专家潘光旦、彭伯等许多教授
学者数十年的研究才逐渐显露土家历史的本来面貌，理顺其发展脉
络。

“南蛮”族类繁多，达数十种。

其中分散或聚居于湘、鄂、川、黔四省边境，长江、沅水之间，武陵山脉各地的先民二千多年来未有全局性迁徙，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民族，就是今天土家族的先民——古代巴人。

对古代巴人的历史，春秋战国、汉唐以降的历史家在大量的南周、“五霸”、“七雄”的历史记载中，间或有片段记载：

《春秋左氏传》（以鲁国纪年为体系记各国史事）鲁昭公九年（公元前536年）周朝景王时代的有个贵族叫詹桓伯的（伯爵）向晋人介绍说：

“自武王克商以来，巴、濮、楚、邓，吾南土也。”^⑩

“巴”既是国名，又是族称。

史实告诉人们：殷代就有“虎方”“巴方”粗略记录。早在西周初年，由于巴人参加武王伐纣的解放战争有功，武王的儿子成王时被赐姓“姬”，封为“巴子国”。（按：公、侯、伯、子、男，到春秋战国时才作为爵位的称呼；“子”在西周表示亲近臣服如子。）东晋历史家常璩（四川紫庆人）著《华阳国志·巴志》曾标明巴子国的国境：

“东至鱼腹，（今四川奉节县）

西至犍（读包）道，（今四川宜宾市）

北接汉中，（今陕西南郑专区）

南接黔涪（今川东南及黔东北，湘西北接壤地区）”^⑪

（注：“华阳国”，是华山秦岭以南广大地区的美称。）

按上述地望，就是湘、鄂、川、黔四省边境。巴子国的南疆，史家称为“巴黔中。”⑫

先后被楚、秦两国侵夺一些地区，尔后又有“楚黔中”“秦黔中”之称。秦亡汉兴，改“黔中郡”为“武陵郡。”⑬三国（吴）时分武陵郡增置“天门郡”以充城（今大庸西郊）为郡治。

至于作为族称的“巴人”，是一个多部落的统一体。其起源一般认为是巴东，建始地区的“南蛮”以及长阳地区的“长阳人”。这两种人类化石的发现，在族属问题上虽然尚有争论，但川东、鄂西很早就有人类的活动，则是公认的事实。巴人^{族谱}，见于正史记载的，始自关于“廪君”的传说。

据范曄《后汉书·南蛮传》载：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樊、鄢、相、郑，皆出于长阳五落鍾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名务相者，因操剑最准，造土船能浮于水，被众人推为君长，是为“廪君”。（部落长）⑭

嗣后，巴人就成了赤黑二穴各民族的统称。所以当楚、秦两国先后侵占巴子国之后，古代巴人被不同部落分别称为“康君蛮”“板盾蛮”，（会用水盾作防身武器），曾向川、鄂、豫、陕逃散，一些分支被汉族同化了；某些分支则躲入深山老林，或於战后逃回湘、鄂、川、黔边区定居下来。其后各历代又有不同的族称；

汉代称：巴郡南郡蛮、武陵蛮（部分是巴人后裔）潯中蛮、澧中蛮、沔中蛮、（潯山蛮）等；

三国、两晋，南北朝称：（除以上称谓外）又别称五溪蛮、酉溪蛮、天门蛮、黔阳蛮、建平蛮等。

隋（唐因之）称为“蛮左”。《隋书·地理》云：

“诸郡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其僻处山谷者，则语言不通，嗜好居处全异，颇与巴渝同俗。”（宏观“山谷”，即指湘鄂川黔山区）

宋代称：（本境）北江蛮。（酉水以北）《宋史·蛮夷传》对蛮区人称为：土民、土兵、土官。也按不同县分叫××蛮。

明清两代称：（本境）土夷、土蛮、土家。《天下郡国利病书》称杂居区为“土汉相杂”。《永顺府志》谈到县学考试录取比例叫“土三客一”。即将土家（蛮）客家（汉）对称起来。

纵观自汉到清二千余年土家族先民族称的演变过程是，由按部族到按地区，由简到繁；又由按地区回到按部族，由繁到简，以与同时代的华夏（汉人）相区别。

到明清之际，曾一度规定：

“土人不许出境；

汉人不许入峒。”①

不论族称怎么变易，其地其民则同。

第三节 大庸土家族的实体

土家族在大庸地区开发、驻息、繁衍的民族实体是什么？同整个湘、鄂、川、黔土家族实体联系起来看，这主要是：历史上先后五次出土古代巴人主要遗物“虎钮錡盃”和“田”“覃”“向”等土家著姓之人口众多。

作为土家族先民——古代巴人，很早就在本境开发与繁衍的历史见证，地下考古发现，最显著的文物是南宋以来先后出土的五件“虎钮錡盃”。除谢迥《容斋续笔》所记的慈利（今大庸）大溶溪五里山出土的虎钮，与《永定县志》所载蔡氏、楚氏、王氏（无出土小地名）以外，有1981年大庸县兴隆公社青天界出土的虎钮及伴同窖藏的“五铢”和“货泉”（铜币）最为珍贵。

湖南博物馆熊传新在《记湘西新发现的虎钮錡盃》一文中断定：

“该窖藏的年代为新莽或东汉初期……而且，其虎钮造型，均与四川涪陵、万县出土之虎钮錡盃相同。”^①

虎钮錡盃是古代巴人祭祀和战斗乐器。在湘、鄂、川、黔边区先后出土数十件虎钮，而大庸一个县就先后出土五件，有明确出土地址的地基又恰恰是本境“蛮”汉边缘区，足见古代巴人后裔曾在此地生活战斗过，这是无可争议的。

巴人后裔由清江流域向东南迁徙，定居于沅水流域，在大庸县境内外，作为民族实体，自古迄今以田氏、覃氏、向氏为最盛。其

生齿之繁，在全县总人口中占有很大比例。

根据1982年民族工作组的粗略调查，即从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中按父系血统，主要聚居乡村估计：田氏五万余人，覃氏近三万人，向氏二万余人，合计约十万余人，（按当时还未计入母系人口，也未正式认定）这些都是见于正史或谱书的土官、土兵、土民的后裔。著姓源流如次：

田氏 《后汉书·安帝纪》及注引《东观汉记》略云：元初二年武陵沅中蛮田山、高少等，因连续七年虫灾，官吏刻薄，激起众怒，攻杀长吏。^⑮据《宋书·蛮夷传》说，（南朝）宋元嘉十八年，天门澧中蛮田向求，因天门澧中令宗炳之徭赋过重，蛮不堪命，起而暴动，均受到残酷镇压。^⑯其后裔恋居故土与播迁流亡者，自各多有。

大庸田氏，以北宋武口寨蛮官（抚判）田承满及其武士之后为最多。

《南齐书·萧颖传》载：酉溪（从湖北宣恩、来凤、湖南、永顺入沅水）蛮王田头拟因汉官“禁断鱼盐”怒杀郡吏，被处赔款，气死。其弟与其子争立，大乱。^⑰

及至北宋真宗咸平，祥符间，田氏沿酉溪自建州峒县多，后称“溪州蛮”。溪州分设二十个小州，以下溪州为“都誓主”，归彭氏，其余都叫“誓下州”，其中以高州田氏势力最大。

《宋史·蛮夷传》载：高州（今越南）刺史田景迁卒，其子田
裔伊继为刺史。裔伊子姪为首长者甚多：

田承进、掌军务；

田承运、为防戍指挥；

田承保、为山河使……

“名豪百余人，显赫一时”。由于真宗咸平六年（1003）高州
“生蛮”掠夺汉族人口四百多，邕州路转运使丁谓集中“蛮豪子弟”
追盗并勒令退回汉人，设此搜捕。至景德四年（1007）广西侬
族地区大姓爆发了“宜州之乱”，北宋朝廷惶恐；因而决定对高州
田氏采取“部分种族”的措施，以削弱分散其势力。^⑮

当是时，即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潯州、慈利“群
蛮相仇劫”（当时大庾为慈利西部各都）大庾田氏始祖田承清很可
能就在这时被任命为“抚谕通判”，率部族来慈利（今大庾）建立
武口寨，（治所在今大庾所乡武溪口），从此遂成为大庾田氏各支
的始祖。

吴恭亨《慈利县志》所载建寨年份与上述相同。^⑯

北宋“部分种族”政策在地方志上也有反映。《来凤县志、武
备志、控制》云：“施州所属田、覃二姓，当宋、元未分之前，其
势甚盛……传之后世，亲者渐疏，遂为仇敌，势分则患少……真制
夷长策。”^⑰

据古老相传：元代高州田氏曾因“义不臣元”受到元军的镇压。

某宗支兄弟九人分别逃亡时，用一支牛角，锯成九节，号为“日”“月”、“星”、“明”、“亮”、“龙”、“凤”、“虎”、“满”各执一节作为重逢相认的信物，是为“九节牛角记”的梗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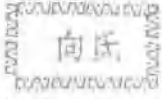
《田氏族谱》叙其祖先原籍时，以为承满本系成都进士，宋仁宗庆历四年来抚武口寨。而侯昌龄《永定乡土志·氏族》则谓“田承满原籍江西南康人也；明初自成都迁岳州，以征蛮功官永定，遂为著姓焉。”二说相距三百四十多年；至于“进士”学位族谱有，乡土志无，皆多矛盾，均无可考。看来，这与封建时代讳言蛮族血统，攀附名郡望族的风习有关，使人难以置信。

覃氏 据《中国人名大辞典·姓氏考略》说，覃，蛮姓。覃氏本谭姓，避难改。张澍云：今蜀中此姓皆音寻。关陇此姓，则为本音。一谓，覃，即覃，古代巴人五姓之一。

谭其骥教授《近代湖南人之蛮族血统》云：“覃氏蛮，东汉时著于潯、澧之间；建初三年，潯中蛮覃儿健等反，永元四年，潯中、澧中蛮覃戎等反。唐宋时著於五溪：唐开元十二年五溪首领覃行瑛“乱”。五代石晋天福中，溪州彭士愁为刘勅所破，遣诸蛮酋长覃行方纳款於勅。宋熙宁中，章勅经制南北江，招纳誓下州峒蛮覃文猛、覃仁霸，各以其地归版籍。……元明以来复著於潯、澧间……除石门外，永定、澧州亦有覃氏，永定较盛。”②

永定覃氏，东汉（如覃儿健后裔等）至唐宋就族。谭先生以为

其后裔南迁常德府属各县。按：唐宋元明以来本境覃氏先民居民均
係自关隘迁回——夔州——恩施——石门一系：其一为从征覃厚之
石门覃添信（茅岗地区）；其一为自石门西迁之覃添顺四世孙彦璜。
（三潭坪等地）②

 向氏 著《近代湖南人之查族血统》以为“向”与“相”
原是同音异译。经与鄂西长阳和湘西桑植的有关记载相印证，其说
确乎有据。谭先生说：

“向氏为湖南蛮姓中之最早见于记载者。后汉建武二
十三年，武陵蛮精夫相单程作乱，相氏疑即向氏，相向同
音而异译也……此役为湖南蛮汉冲突之第一声……唐宋以
来，向氏遍处于资、沅、澧三水之间。

“唐乾符六年石门“蛮”向 璠陷澧州。历三十余年
至梁。乾化二年降於马楚。（楚王马殷）宋、靖康以来，

“盗贼”盘踞澧州所属，独慈利向思胜等五人，素号溪峒
归明，能保境安民。此向氏之见于澧者也……

“北江一带之桑植、上下峒，驴迟峒三土司传袭至清、
雍正年间，始尽革除。……”③

另据《宋史·查夷传》载称：

富州刺史向通汉曾为五溪诸州统军；南北江（即沅水
南北）向氏刺史土酋甚多，都属辰州节制。④